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丛书主编 / 郑新蓉 胡艳

编著 / 魏曼华 王成龙 阿呷热哈莫 等

大山里的开拓与守护

——
少数民族乡村教师口述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乡村教师口述史
系 列



广西教育出版社

乡村教师口述史系列

大山里的开拓与守护

——少数民族乡村教师口述史

丛书主编 郑新蓉 胡 艳

编 著 魏曼华 王成龙 阿呷热哈莫 廖 君 崔明坤
敖俊梅 蔡凡弘 沈晓燕 王思人 包 锋
阿里木拉 乌妮尔 韩雪军 金 瑛 旦巴加措
佟 彤 张 坤 王利利 刘宝源 任梦莹
伊师孟 吴俊毅 宋华妹 谭钧林 班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山里的开拓与守护: 少数民族乡村教师口述史 /
魏曼华等编著.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18. 8
(乡村教师口述史系列 / 郑新蓉, 胡艳主编)
ISBN 978-7-5435-8555-3

I. ①大… II. ①魏… III. ①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
育—教育史—史料—中国 IV. ①G72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7564 号

DASHAN LI DE KAITUO YU SHOUHU
SHAOSHU MINZU XIANGCUN JIAOSHI KOUHUSHI

总 策 划:	石立民	陆思成	吴春霞	黄敏娴
策划编辑:	周 影	夏日炎	责任编辑:	夏日炎 黄 曼
封面设计:	杨 阳		责任校对:	谢桂清
责任技编:	蒋 媛			

出 版 人: 石立民

出版发行: 广西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广西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电 话: 0771-5865797

本社网址: <http://www.gxeph.com>

电子信箱: gxeph@vip.163.com

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5-8555-3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一

钟秉林

早在几年前，就听郑新蓉教授说她在组织团队搜集、整理新中国乡村教师的口述史，现在这些教师口述史即将在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觉得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出现一定的曲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特别是教育历史进行深入的梳理和研究，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当代社会，把握当代中国教育特征与问题以及人民大众对教育的需要，最终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的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往教育史研究更多地关注制度、思想、重要人物、教育普及等大历史，很少关注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个体的历史。乡村教师是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基层落实者，更是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教师自身的生命经验和作为教育亲历者的叙述，可以从更细微、更具体的层面深入反映新中国教育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反映新中国教师的气质和精神面貌。忽视乡村教师的历史，很难算得上是完整的教育历史。忽视教师作为亲历者对不同时期教育实践活动的描述，仅仅依赖宏大叙事的概览，显然是有局限性的。

口述史研究通过对当代人物的访谈，既可以收集储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事实，又能够反映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及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种历史诠释和知识建构的学术路径。近年来，虽然不少学者也在关注口述史，但是关注乡村教师口述史的学者还非常少。在我看来，通过口述史来还原乡村教师生命经验，再现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波澜壮阔的历史，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我国是农业大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村人口的数量远远超过城市人口，农村的地域范围之大也远在城市之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村教育的发展水平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基础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但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被迫现代化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乡村、乡村教育并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相应的发展。中国现代乡村教育获得大力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历代乡村教师艰苦卓绝的奋斗，我国的现代乡村学校由无到有，由借用宗祠、寺庙、民宅，一两名教师、几个学童组成的小学校，变成后来教学楼、运动场、教师和学生宿舍楼齐全，配有各种现代化的教学仪器和实验器材，能容纳上千人的现代学校。这中间，乡村教师功不可没。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这块基石的奠基者，而乡村教师是新中国乡村教育的奠基者、开拓者和建设者。

虽然党和国家会定期表彰一些为乡村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但对占教师比重较大的乡村教师整体而言，受表彰者毕竟是少数。以郑新蓉和胡艳老师为总主编的“乡村教师口述史系列”的出版，无论是对庞大的乡村教师群体，还是口述史学研究都是件幸事，也是大事。这套书涉及的乡村教师从地域上来说覆盖了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教师的出生年代来看覆盖了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每个阶段，从民族构成来看包含了14个民族，从时间维度上看包含“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新中国第二代乡村教师”和“乡村青年教师”三个群体，从身份维度上还包含了“乡村女教师”和“少数民族乡村教师”两个群体，基本上覆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类型的乡村中小学教师。这套书所涉及的乡村教师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环境的巨变，他们见证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各个时间节点上乡村社会与教育的巨大变迁，以及不同政治环境中乡村教师的存在样态。可以说，这套书从多个维度生动地、全方位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的工作、生活，记录了不同地区乡村教育的历史演变。这套书在帮助我们了解乡村教育发展历程的同时，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为新中国乡村教育开拓、建设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乡村教师群体的理想、信念和情操，以及他们对乡村孩子、乡村教育的大爱。而且，这套书的出版对补充现有当代教育史料、推动当代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更为可贵的是它对于促进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推进口述史方法向教师教育领域拓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教育改革不断深化、教育信息化程度快速提升的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乡村教育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更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均衡发展。任何发展现状都有历史继承性,要深入理解今天我国乡村教育的现实,就必须回顾过去的历史。当我们从教师个体的记忆中将过去发生的点点滴滴挖掘出来以后,乡村教育的发展逻辑也会在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视野中逐渐变得清晰。因此,通过这套书中多位教师的口述史,我们可将当下对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发展的思考置于微观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审慎的考量,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教育现状、明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口述史的搜集和整理是一项非常艰苦,十分耗费人力、财力的基础性工作,要求从事者有很高的史学素养和高度负责任的历史态度,特别需要研究者深入田野,不畏艰苦地探访、搜集与挖掘。感谢郑新蓉教授带领的团队为此做出的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

是为序。

2018年1月

总序二

郑新蓉

历时几年的“乡村教师口述史系列”第一辑终于出版了。这套五册的“乡村教师口述史系列”涵盖新中国成立至今工作在乡村的主要教师群体——第一代乡村教师（新中国成立之初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入职）、第二代乡村教师（1958年“大跃进”至70年代入职）、乡村青年教师（当代）、乡村女教师、乡村少数民族教师。他们的口述给我们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奋战在我国一些贫穷的山区、村落，以及少数民族聚集地的乡村教师群体的工作、生活及其精神风貌。

这套书出版的缘由很简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团队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致力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和改进工作，在跋涉千山万水，与坚守在偏远、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近距离接触后，为他们长期甘于寂寞与清贫、默默奉献乡村基础教育的精神所感动，着手进行乡村教师口述史的工作，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口述，描绘新中国乡村教育的变迁以及乡村教师的精神风貌。2012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团队开设“教育社会学研究专题——中小学教师口述史”的研究生课程，邀请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学研究科教授新保敦子做了《用life story分析方法的教育史研究》的讲座，为开启教师口述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在进行当代教师教育史和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同时，也着手乡村教师口述史的工作。我们的团队由此扩大。随后，我们成立了“教师口述史中心”，共同致力于教师口述史的搜集、整理、教学与研究。机缘巧合，我在一次会议上碰到了广西教育出版社的石立民老师。历史专业出身的她对口述史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教师口述史对教师、教育研究的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对我们的乡村教师口述史充满了兴趣，从而促成了此次的合作。2016年，该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扶持，进一步促成了这套书的出版。

具有很高学术声誉，在全国教育领域占据领头羊地位的北京师范大学，为何

要从事这样一个面向乡村教师的口述史研究工作，出版这样一套看似学术性不强的图书，研究的对象又是在社会和教育领域缺乏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教师群体，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为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明。

一、乡村、乡村教育对中国社会的意义

（一）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根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在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断裂的华夏文明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孕育和维持的。几千年来，在乡村这片土地上，我们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依赖于这片土地的给予养育着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为这片土地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扎根于乡村的儒家文化不仅培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对东亚乃至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

即便是经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的洗礼，乡村社会在中国社会中依然占据很高的位置。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往上追溯不了两代，就会有来自乡村的血脉。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还保留着很深的农业文明的痕迹，无论是传统的孝道的恪守，还是节气对生产、生活的指导，都体现出传统农业文化的影响。甚至我们平和、包容、散漫的性格都源自农业社会的熏陶。可以说，没有乡村，就没有五千年流光溢彩的华夏文明，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荣耀。

（二）在现代化历程中乡村逐步衰落

但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我们的乡村却一步步走向衰落。在现代化历程中，中国的乡村是被现代化的主体，但同时又是在现代化历程中遭遇最多不适和困境的地区。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的历史既是中国一步一步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历史，也是代表农村文明的中国乡村逐步走向衰落的历程。乡村的衰落在中国社会艰难但还算成功的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点缀了并不美好的一笔。

在中国走向工业社会的艰苦历程中，乡村成为人才的输出地、资源的供给处。大部分乡村的精英、优秀人才不断进入城市，却忽略了乡村的建设发展同样需要睿智的领导者 and 能干的建设者。中国要真正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现代化国家，乡村的重振和繁荣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并要付出更多、更艰苦的努力才可能达成目标的。

（三）乡村教育是乡村社会重建的重要途径

1. 教育是实现国家统一、国家重建的重要渠道。

教育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已经被无数次地证明了。中国自秦汉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以来，教育在国家统一、国家治理、国家建设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隋唐以来的科举制更是通过考试，把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式强约束在封建王朝所需要的人才培养上，使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多元、分散的小农社会强力地统一在各个封建王朝之下。

清末民初，教育更是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时局里实现“自强求富”“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现代学制的建立，现代科学知识和教育教学方式的采用，是当时清王朝培养现代人才、建立现代社会的唯一途径。也正是有这样的认识，清末民初，无数有眼光、有担当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无能的政府和落后的经济发展局面，或抛家舍业，捐资助学，如张謇、严修、杨斯盛；或凭借平生所学努力筹办学堂，培养新国民，如张伯苓、陶行知；或坚守清贫，培养莘莘学子而成为默默无闻的教师。这才使我国在内忧外困、民不聊生、政府极为腐败的年代，现代化进程得以缓慢地推进。

民国后期，特别是战火连连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以及无数在战争中坚守的中小学校，为我们培养了坚守国家信念，坚信中国文明，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现代知识的社会中坚，他们与广大不屈的人民同仇敌忾，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不仅培养了能在国际科技舞台上领先的陈景润、王选、屠呦呦等科学家，也使与教育基本绝缘的广大工农大众子弟接受了基本的教育，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没有勤勤恳恳奋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就没有今天稳定、繁荣、富足的新中国。

2. 乡村教育是乡村重建的基础。

乡村建设同样要依赖于教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为首的

知识分子，面对由于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的强势入侵，以及动荡的政治秩序、军阀混战等不断侵扰下的乡村飞速“破产”的局面，带着从西方学来的所谓先进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博士下乡”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梁漱溟的“乡建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和卢作孚的“经济建设派”等，从各自对乡村“破产”的原因认识的角度出发，开出了自己治理乡村的“药方”。无论是晏阳初的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还是梁漱溟的“政、教、养、卫”综合治理方式，以及黄炎培从发展职业教育开展的乡村治理等，都把教育作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但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下，以及他们自身理论的缺陷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的实验无一例外的以失败告终。但他们的实验却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教育是解决当时乡村社会“愚、弱、穷、私”的重要手段，更是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途径。

任何社会的治理和重建都需要人才的保证。少了治理和建设现代乡村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现代知识和现代公民意识的乡村人才，没有代表服务乡村社会、代表乡民利益且能和外来资本抗衡的人才，就没有现代乡村建设的可能，也没有乡村的未来。可以说，今天乡村的重建和繁荣必须依托于乡村的教育。

二、乡村教师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群体

中国的乡村教师自古有之。古时的私塾先生是帝王威严和政令的传递者，他们在封建帝国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以及传统农业社会治理人才的造就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乡村教师，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为乡村乃至国家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第一，乡村教师利用自己并不丰厚的知识基础和能力，撑起乡村基础教育的一片蓝天。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并不处在同一发展基础和平台上。由于国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极其有限的人力条件，以及在“冷战”和相对孤立的状态中自力更生建设工业化强国，我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

上牺牲乡村、乡村教育来发展工业化。但这一时期，是我们的乡村教师用自己并不坚实的肩膀为乡村孩童支撑起教育的蓝天。

由于现代教育基础薄弱，我国不少乡村地区的中小学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乡村教师首先建立的。他们或利用村里的祠堂、庙宇，或借助社队仓库、闲置屋，或借用村民的住宅，或自力更生建起茅草屋，使当地的孩子不用跋山涉水，在家门口上起了现代中小学，也使当地很少有机会上学的女孩子接受了学校教育。他们因陋就简，在教材不足时自编教材，在师资不足时任全科教师，甚至在没有基本的教室时把自家的房屋贡献出来，为乡村的孩子开始了早期的启蒙教育。

他们中的多数人会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交学费；会在粮食短缺的年份省下自己的口粮补给学生；会因为山路遥远不放心学生安全，每日放学送学生回家；会在学生不慎掉入水中的时候，不顾水流湍急，跳入水中救起年幼的生命，也让学生有了长大后当老师的美好愿望。他们还会在学生与家长剑拔弩张的时候，和声细语地做学生工作，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家校关系。

大多数乡村学校干部和教师，会在条件简陋的当时，请求乡政府辟出几分地，业余时间带领学生除草、种菜，使学生告别了咸菜就剩饭的日子。他们还会凭借朴素的情感和公关能力，让上级部门和企业批给他们紧缺物资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把茅草屋和四面漏风的教室建成窗明几净的教学大楼，为学校建当时最好的实验室，把学生上学的泥泞路铺成了柏油马路，使校园成为当地亮丽的风景线。他们通过艰苦的努力，使原本只有几个人的山间教学点成为拥有几百几千学生，教学条件良好，教学质量上乘，在当地很有吸引力的学校。

可以说，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代代乡村教师不顾清贫，不畏艰辛，长期奋斗在乡村教育一线，就没有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可能，以及稳定、繁荣的今天。

第二，乡村教师使得依然还处在传统农业文明的乡村与现代社会联系在一起。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定，我国一些乡村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大多数时期仍然处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中。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他们所依赖的生产生活的知识和能力，基本上还处在前现代时期的农业社会里。但由于现代乡村学校的建立，现代乡村教师的存在，使得这些古老而相对孤立的乡村与现代的城市连上了线。

乡村教师用和城市孩子一样的教材，给乡村的孩童们打开了现代文明的窗口。他们教给学生现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农业知识和公民意识，使他们能用这些知识指导自己及家人的生产、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教师，他们把自己在城市、在大学接受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文明传授给学生，让学生知道了互联网、高速铁路等现代知识，知道了知识的力量和现代公民意识。他们中的一些人，生怕孩子与现代社会脱节，利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带孩子外出看世界，让孩子了解广阔的世界，也让孩子在心中树起了远大的理想。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乡村教师把自己与乡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建设乡村。他们或因地制宜，为乡村设计和建立小型水电站，使得基层政府、村民、学校都用上免费的电；或帮助安装电视信号接收器，使当地的老百姓能看上电视。他们中的不少人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生产队修理农业机械、广播电视设备，甚至村民家里的电器、农具等，使得当地的村民生产、生活能够顺利开展。即便是在“大跃进”时期，生产队研发新型农具，加速农业建设的年代，我们的乡村教师也在其中贡献着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可以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正是由于乡村教师的存在，使原本依赖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孤立的乡村社会不被现代社会所抛弃。

第三，乡村教师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给乡村，维护了乡村的稳定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切实落实党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指导思想，他们还通过各种方式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下去。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扫盲运动，就是以乡村教师为主力开展的。他们在教乡村百姓识字的同时，教给他们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既丰富了当地村民特别是青壮年的业余生活，也提升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作为当时农村较少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当地基层政府开展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如党和政府各时期的方针、政策是乡村教师通过写标语、出墙报、画漫画，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生产一线演出等方式在农村进行宣传的，为乡村的稳定和发展贡献了力量。

三、教师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

口述史的兴起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掀起的“自下而上”的撰史浪潮相吻合。这一浪潮带来研究视角的根本变化，即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上层社会的精英转为普通的人民大众，口述史学则成为他们实现这场转移的有力武器。^①让老百姓通过自身的口述发出自己的声音，使普通人的经历、行为和记忆有了进入历史记录的机会，并因此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当代乡村教师口述史的搜集和整理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丰富当代教育、教师研究的资料。由于对史料认识的狭隘化，教育资料的保存范围有一定的局限，即便是与我们很近的当代社会亦是如此。除了颁发的政策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校发展的统计数据，很多重要的资料是缺失的。以乡村教育发展为例，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当时，各地的乡村学校是如何建设发展起来的；教育政策是如何在乡间落实并因地制宜的；在师范院校无法提供基本的师资保障的一些时期，乡村教师队伍是如何建设的；我国乡村教师的教育精神和情怀是怎样的，如何体现的；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的方式途径有哪些，有哪些独特经验和教训；等等。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当代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历史以及中国教师专业发展的经验和理论有很大的价值。教师口述史能为教育研究、教师研究提供很多鲜活的、落地的、有价值的史料。

其次，另类教师史的写法。至今，我们没有一部中国教师史，或者当代乡村教师史之类的著作。作为职业群体中古老而又极为重要的一个群体，作为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个群体，我们有必要为乡村教师撰写历史。但我们做的这套书不是传统的史学著作，而是通过教师口述史的方式，用乡村教师自己的语言和声音，用自己的记忆和情感，书写一部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 21 世纪的今天，在相对落后的乡村从教的教师的历史。通过他们对自己生命历程、职业生涯，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教师与乡民关系等的口述，勾勒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代乡村教师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教育情怀、身份特征，以及他们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在他们的口述中，我们看到了经历了革命、斗争、建设和经济

^① 定宜庄，汪润. 口述史读本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发展等时代主题的乡村教师，他们承担着连接现代国家和乡村的使命。与此同时，他们也追求根植于家庭和村落的“修齐治平”、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等乡绅文化传统。相信这些乡村教师所经历的艰苦的自然条件、生计需要、个人专业发展的压力、快速的城镇化进程等正在重塑今天乡村教师的身份特征，也影响着当代乡村教师的稳定和工作动力，改变了教师与农村社会的关系。^①

再次，寻找中国自己的教师发展和乡村建设的经验和理论。目前，教师教育的经验和理论依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虽然为中国的教师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但也的确出现水土不服、浪费资源的状况。我们相信，拥有几千年辉煌教育历史的中华民族有贡献于世界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和经验。后发展地区中落后乡村的教育发展、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世界性的难题，直接影响到了该地区该国家教育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虽然我们不敢说中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但通过乡村教师口述史，我们发现我国的确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创造了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辉煌，实现了让每一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的目标。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我们建设了一支踏实、肯干、积极奉献的乡村教师队伍。他们可能学历不高，但他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在缺文少教的年代，他们为乡村孩童点亮智慧、文明之光。他们刻苦钻研，努力工作，克服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以及领航者少等困难，尽可能地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在工作负荷重，生活压力大，且留守儿童多的今天，多数乡村教师能恪守教师职业的操守、伦理，在夯实乡村孩子知识基础的同时，尽可能地用教师之爱来温暖和呵护这些乡村的学童，让他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相信这种教育发展、教师成长的经验应该对世界也是有启发的，同样，我们也可以从中提取中国的经验。

在本文的最后，我要感谢为此套书提供口述材料的乡村教师，是你们的分享和传递让我们的工作成为可能；我也要感谢参与此套丛书采编工作的师生们，是你们的努力才使乡村教师的声见诸世间。我还要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们，是你们的努力让我们这套口述史丛书顺利出版。

2018年1月

① 郑新蓉：《共和国五代乡村教师代际特征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3）。

前言

魏曼华 王成龙 阿呷热哈莫

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为“显学”，各学科研究者都从自己的学科视角进行口述史研究。作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者，我们应该利用口述史的研究范式，并赋予其教育社会学的意涵。那么在中国少数民族乡村教师的研究中，我们为何选择口述史，而不是其他的研究范式呢？

一、教育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视角

（一）个体命运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依托口述史的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更表明了结构性力量无处不在，而这也正是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给予社会学最重要的贡献。社会结构无形的力量对社会成员的个人境遇和生命轨迹有着深刻的影响，不同性别、阶层、民族、年龄的个体在社会生存、发展机会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本书我们能看到个体与社会结构的联系，以及社会历史进程对个体命运的影响。本书正是通过对教师个体生命故事的回溯，分析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中，尤其是社会结构变迁对教师生命轨迹的作用和影响。从本书 14 位教师的生命轨迹，可以看出个人的境遇看似偶然，实则背后有着社会结构性的原因。

此外，从少数民族现代教育与教师个体的结构关系来看，利用教育社会学口述史的研究范式，我们可考察中国少数民族乡村教师与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的复杂关系，否则我们就很难了解少数民族乡村教师，也很难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口述史是理解教育结构变迁的较合适的方法之一，因为通过此种方法，我们才能把某段历史、某项制度分解成为它们的各个组成要素，从而展示这些要素是怎样相继产生的，并放置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之中。

（二）解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教育历史

教育社会学的口述史视角将解构以往教育研究中宏大叙事的格局，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分析社会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能动与被动，探索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个人记忆，包括教育记忆的社会建构，力图发现在宏大叙事中，那些失声、失语的社会角色对社会结构的功能。不难发现，在以往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宏大叙事的观念长期主宰着社会学的研究和著述，因此我们常常忘记了现代教育的历史本身是多维度、多层面的，普通教师的上学、就业、婚姻等故事其实也是历史概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致力于理解和阐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

利用口述史的研究范式是教育社会学在现代教育研究中的解构，是解构主义在现代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它打破了现代主义的正统原则和标准，打破了现有的对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教育研究的单元化的秩序。具体来讲，这种解构不仅打破了依据主流文化而建构的少数民族教育秩序、道德秩序、伦理秩序，而且还打破了人们对少数民族教育意识的秩序，比如上学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民族性格。教育社会学中的口述史将在打破秩序后创建一种更为合理、更为接近真实的秩序。本书故事人物的口述文本，是对教育历史的一种解构阅读，而这种解构阅读呈现的文本并非单一的个体在传达一个明显的信息，而是在某个特定的文化或世界观中冲突的体现。因此在本书中，一个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有时还会彼此冲突。

（三）口述史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

在教育社会学中，用人物口述史的方法研究某一类教师群体，实质也是一种“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该研究范式产生于20世纪初，并在六七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它以个体生命过程中的一些事件和角色，及其先后顺序和转换过程为研究对象。区别于以往的叙事研究，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关注人一生的生命轨迹，因此它并非生命片段的节选，而是关注宏观与微观互动的过程与结果。此外，区别于叙事研究，以口述史为依托的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打破了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尤其是社会个体生活研究中宏观与微观长期隔离的状态，它要求在一个共同的概念和经验性研究的框架内对个体生命事件和生命轨迹的社会形式做出诠释。

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依托口述史的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注重历史事件对

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大动荡中，社会和教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中国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地改革、扫盲运动、“反右倾”斗争、“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作为当时远离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教师，他们经历的历史动荡就更为剧烈。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作为社会文化代表者之一的少数民族教师，他们既要承担教师的社会角色责任，同时也面临着文化冲突和角色冲突。

少数民族教师的生命历程与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他们个人的命运沉浮不仅直观地揭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折射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现代化中的矛盾、困境及各因素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对这些矛盾及微妙关系的理论阐释，无疑将拓宽和深化我们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全貌和机理的理解、把握。

从时空生活来说，本书所选取的14位少数民族乡村教师，其出生年代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从他们个体的生命轨迹来看，同一年代的个体在社会变迁中呈现出有规律可循的模式。少数民族教师是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个体，对于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人来说，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社会景象是有差异的。因出生年代不同，他们所拥有的社会机会和个体所受到的社会限制也是不一样的。当社会变迁对一代又一代的同龄群体产生不同影响时，生命轨迹的历史效应就会以同龄群体效应表现出来。因此，从教育发展阶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少数民族教师群体，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办学、建校等最基本的学校教育的建设中，对少数民族学生汉语言的识字教学成了紧迫性的教学任务；而对于80年代出生的少数民族教师群体来说，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人口流动、移民搬迁等社会现象的出现，给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他们需要面临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告诉我们，人在哪一年出生和属于哪一个年龄群体基本上将人与某种历史时空联系起来，它是进行生命历程范式分析的重要因素，而不同代际的个体则因阶层、族群、民族、教育经历、年龄等呈现了另一种差异性。

从个人的能动性来说，我们也看到同龄群体个性化的东西。每位教师的社会阶层、民族、性别、教育、家庭背景以及个人性格的差异，反映出每个人的不同的能动性。可以这么说，在社会结构中，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个体，而是在一定